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晏阳初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徐珍珍¹, 邵建东²

(1.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7;2.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0)

摘要:源于儒家传统思想、西方基督教文化和华工服务实践的影响,晏阳初立志终身投身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乡村建设方案,呈现出现代性、实用性和整体性的特征。结合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发展需要,晏阳初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理念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实践表明:农村职业教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专业人才培养队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保障;内生式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路径。

关键词:晏阳初;平民教育;乡村建设;乡村振兴;农村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19)0006-0092-05

我国作为农耕形态最完备的文明古国,乡村社会一直保持着高度稳定的自治状态。但20世纪30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侵略,以及国内严重的兵祸、匪患、贪官污吏和自然灾害,^[1]我国农村因空前的社会变革陷入了深刻的生存危机。因而,各类型的乡村建设实验开始兴起,并演变成一场具有较广泛影响力的社会运动。在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留美归来的晏阳初融合中西文化,开创了独特的平民教育模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方案,希冀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道路。尽管这一模式最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当时中国农村落后和贫穷的问题,但其先进的办学理念和丰富的实践探索对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晏阳初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缘起

1920年,晏阳初学成回国,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并发起了全国识字运动。1923年3月,他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经过两年多的实地调查,最终选择河北定县作为平民教育的实验试点。20世纪30年代初,晏阳初在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得到了国民政府民政部次长的肯定,并决定将晏阳初的经验向全国推广,设立乡村建设育才院。1940年至1949年,晏阳初在重庆歇马镇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改名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设有乡村教育系、农业系、农业经济系、水利工程系和社会行政系等)并任院长,组织开展华西乡村建设实验。20世纪50年代以后,晏阳初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及加纳等

收稿日期:2018-12-21

作者简介:徐珍珍(1988—),女,硕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邵建东(1972—),男,博士研究生,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基本原理。

国建立乡村改造促进会。20世纪60年代,晏阳初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任院长及理事会主席。

在民族危难之际,晏阳初不求做官发财,从城市到农村,从国内到国外,终其一生投身于贫困地区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事业。正是这种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关心以及长期深入农村开展乡村教育的实践行动和执着奉献精神,晏阳初深受人们尊敬,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与陶行知先生并称“南陶北晏”。追本溯源,晏阳初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主要源于如下三方面的实践经历。

(一)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奠定了天然的文化情感

在师塾兼乡医父亲的教育下,幼年的晏阳初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我自民视,天听我自民听”的儒家民众观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一生。他很早便意识到人民是国家最基本的要素,平民之程度高低关系国家发展之强弱。在当时以农立国的社会背景下,广大农村和四万万人民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依靠,而这四万万人民中80%是文盲,且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即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为根本的问题。因而,晏阳初清晰地认识到平民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民众力量的伟大和无穷。“我中华四万万民众共有的问题,欲根本上求解决的方法,还非从四万万民众身上去求不可”,^[2]他强调“以教育为命根,国家乃有振兴之望”,并将平民教育上升到教育救国的高度。只有通过平民教育才能真正改变世代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将之改造成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的“新民”,才能改善农民生活、稳定农村社会、改变贫穷落后,最终实现救亡图存、富民兴邦的历史使命。

(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博爱的慈善心理

由于父亲被聘为巴中西门外基督教福音堂中文教师,晏阳初十多岁便开始接触基督教和传教士。当时,谙习时势的父亲深知“书香之外另有世界,西学乃潮流所趋”,毅然将年少的晏阳初送到

基督教创办的西式学堂接受新学。在保宁府西学堂,晏阳初遇到了朝气蓬勃、关爱学生的姚明哲牧师。1913年,在英国传教士史文轩的资助和伴送下,晏阳初远赴香港求学,随后,又前往宗教气氛浓郁的耶鲁大学深造。西式学堂所传递的博爱情怀、慈善心理和积极乐观为晏阳初后来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造就了一位矢志不渝的虔诚教徒。他也将自己比作平民教育的传教士,“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

(三)刻骨铭心的华工服务,产生了由衷的实践情感

耶鲁大学毕业后,晏阳初应北美基督教青年会之召踏上了奔赴欧洲战场帮助旅法华工的征程。一战期间,英法两国先后从中国招募了20万华工在欧洲战场上从事挖战壕、修公路、建营房、运弹药、装物资等极为危险的工作。在帮助华工翻译、写信和汇款的日常工作中,晏阳初亲眼目睹华工们饱受疾病和思乡的困苦。尽管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同英法军人一样英勇、热情和智慧,却依然备受歧视。通过深入调查,晏阳初意识到华工们与外国人存在差距的根源在于他们缺乏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而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给予华工们精神抚慰和提供识字教育机会。于是,秉承“人人皆可为尧舜”的理念,晏阳初创办了华工识字班,并选择中国简易文字用白话文形式编写了《华工周报》,为华工们学习知识、培养道德、联络感情提供了活动媒介。经过一年的努力,华工扫盲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识字人数由原来的不到20%上升至38%。这段特殊的工作经历促使晏阳初萌发了为平民服务的志向和坚定举办平民教育的决心,立志回国后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平民教育事业,为成千上万没有文化的男女老少普及教育,尤其是要向那些超过上学年龄和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的人传授文化知识,以解除苦力的“苦”,开发苦力的“力”。

二、晏阳初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特征

晏阳初在广泛、深入和科学的社会调查基础上,提出了一套相当完整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乡村建设方案,并选择河北定县作为实验试点,开

创了国内首个以县为单位从事乡村教育实验研究的范例。分析其思想和实践,具有如下三方面较明显的特征。

(一)现代性

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是一场曲线救国的教育改良运动,其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再造新民。早在1934年的农村工作讨论会上,晏阳初就提出乡村建设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重大使命,最终目标不是物质的改善,而是人的改造,而要解决人的问题,教育是根本着力点。因而,为了革除“愚、贫、弱、私”而造就“新民”,他倡导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穷,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用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3]二是推进基层民主建设。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4]在如何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问题上,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从制度上突破了原有乡村治理方式,通过建立乡镇建设委员会、公民训练班、公民服务团等自治组织,开启了乡村自治管理的现代意识。即使后来因抗日战争爆发,定县实验被迫中断,但乡村建设运动并没有终止。在中央当局的大力支持下,晏阳初及其平教会同仁全力投入动员全民国防计划,从基层政治建设入手,一边开展民众组训,一边推行新的县政制度,以唤醒民众抗日爱国热忱和民主平等意识。自秦设县以来,县就成为我国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的聚结点,基层组织管理基本依靠县治。但与以往的制度相比,这种新的县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具有与军队和民众通力合作的优点,无不孕育着进步和民主的思想萌芽。中央当局也高度重视基层政治建设,并在全国推行这一新的县政制度,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夯实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也有助于创立真正平等、民主和现代的中国。

(二)实用性

晏阳初在平民教育中始终秉承以民为本的思想,所学即所用,所用即所学是其办学理念实用性的高度概括,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设置实用性课程。接受教育是农民的权利,但在生计所迫的情况下反而成了一种义务。晏阳初深知要激发农民的教育热情,实现农民在教育 and 生计

之间的平衡,根本出路在于遵循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提供农民需要、满意的课程内容。如在农业生产方面,教授农民如何种植优质农作物;在农村工艺方面,教授农民改良手工业;在农村卫生方面,教授农民基本的医疗保健和预防知识等。二是编写浅显教材读本。他十分注重平民教育课程载体的实用性,“要化农民,必先农民化”,他深入研究农民的需要、农民的心理和农民的生活,留意农民日常生活中惯用的词汇和语言,并结合法国教授华工识字的经验和陈鹤琴研究的“语文体应用字汇”高频词汇编成《平民千字课》,很好地弥补了文字教学脱离实践的弊端。为巩固脱盲者不复盲,他进一步编写了《农民报》《士兵周刊》《士兵月刊》《平民字典》等浅显读本。三是提倡白话文改革。当时的典籍和报刊多采用文言文形式,而农民从来没有学习复杂难懂的文言文的机会,也缺乏其使用的环境空间。因而,晏阳初倡导一方面在实际教学中应教农民喜闻乐见、生动流行的口头语,另一方面则主张采用白话文的形式编写典籍和报刊等。四是采用灵活的教学策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教育对象采用不同教材实施不同形式的教学方法,如经济发达地区采用单班授课,而经济不发达地区则采用大班授课,且识字教材一般都结合农民实际生活进行插图配画,通俗易懂。此外,为了缓解教师紧缺,能够较低成本实现相关知识的普及,他采用导生传习法,通过先入学者管理和带动后入学者的方式,有效促进了知识和实践的结合。

(三)整体性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是系统的、非线性的要素联系,其整体性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教育与建设的整体性。晏阳初对当时中国乡村社会的认知洞若观火,认为纯粹的平民教育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教育的内容就是建设的需要,教育的过程就是建设的过程,教育就是建设活动。^[5]因而平民教育必须和乡村建设紧密结合,以平民教育促进乡村建设,以乡村建设带动平民教育。但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时期教育与建设的侧重不一,结合的紧密程度各异。早期,晏阳初更注重平民教育,源于长沙、烟台、嘉兴等城

镇平民大众识字运动的经验,他意识到农民才是平民教育的主要对象,因而1929年他将平教会总部迁往定县,由此拉开了定县乡村教育实验的序幕,同时也标志着教育工作重心从城市到农村的转移。但后来因战争等诸多因素影响,1936年平教会总部迁到长沙,其战时工作重点也转移到了乡村建设上,但这种转移是以教育为基础的。如华西试验区因政治因素的存在更加注重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结合,倡导将乡村建设中的问题作为教育的出发点,从而实现以教育推动乡村建设。二是教育内容的整体性。平民教育的宗旨是除文盲,做新民。晏阳初认为中国民众存在“愚、贫、弱、私”四大病症,其中愚是指绝大多数农民不识字,也就无法通过阅读了解外面的世界;贫是指当时的农村生活极端困苦,再加上战争的蹂躏,生存成了广大农民最迫切的渴望;弱是指农民身体素质因缺乏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而羸弱;私是指农民冷漠、自私的精神状态。且“愚、穷、弱、私”是相互连锁的关系,必须整体推行集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于一体的教育,并统一于乡村建设实验中。三是教育方式的整体性。为造就富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的“新民”,晏阳初针对不同的对象开创了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各具特色的教育方式,推动教育模式由“学在官府”向“学在民间”转化。其中学校式教育主要以平民学校为中心,解决青少年农民和青年农民的教育问题,并建有层级完善的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和平民大学教育体系;社会式教育主要以平民学校毕业生生活为中心,通过讲学、表演等方式开展多元化的社会教育活动;家庭式教育则以家庭为单位,一方面有利于横向联合各个家庭中地位相同的分子施以相当训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家庭内部之间的相互教育及家庭的社会化。

三、晏阳初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当代启示

晏阳初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践蕴含丰富的平民主义职业教育思想,结合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挖掘和反思其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践,对于当前改革和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农村职业教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和农村发展的不充分。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和复杂性的社会工程,农村职业教育必须担负历史使命,服务建设发展需要。第一,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乡村产业纵向上延伸和横向上拓展的过程就是所需人才职业分化和升级的过程。^[6]要想深度激活乡村经济活力,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需要培养数以亿计各类乡村人才,我们必须正视目前乡村人力资源基数大、素质低、能力弱的“短板”。一是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传统农民更多的是被视为社会学意义层面的“身份”,而新型职业农民则被视为劳动经济学中的“职业”。^[7]从“身份”到“职业”的变革,意味着现代农业从业者持续职业化的结果。面临大多数农民缺乏现代化的专业技术技能和市场经营管理能力的现状,各职业院校应根据乡村产业发展和新型职业农民类型需要提供多品类、多层次、系统化的涉农培训,将农村普通劳动力真正培养成适应现代化农业生产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二是广泛开展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一方面提供服务农村剩余劳动人口就业转移的技术技能培训,帮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常态化的培训逐渐提升乡村农民的文化素养,营造文明乡风,构建面向乡村振兴战略的终身教育体系。三是主动承担普及农村高中阶段教育重任。努力让每一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农村职业教育的重大历史使命。第二,服务农业现代化建设。晏阳初在乡村建设实验中尤为重视现代技术对农村农业的改造,但因人力和物力条件的限制决定当时的实践更多的是对技术的普及和应用。而当下农村职业教育除了为农业现代化培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带头人等专业技术人员,更重要的是发挥学校农业科技研究中心、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等技术研究开发功能,带动农村农业科技成果的实验、示范和推广,服务农业的机械化、规模化和现代化生产,为乡

村产业兴旺注入科技活力。

(二)专业人才队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保障

晏阳初乡村建设实验是一场以他为首的知识分子运动,它的蓬勃兴起和成就取得离不开团结在他周围的一大批胸怀报国之志的优秀知识分子。为了在定县实现平民教育的梦想,晏阳初招募了瞿菊农、陈筑山、冯锐等16位主要成员,其中瞿菊农是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傅保琛是康奈尔大学乡村教育博士、熊佛西是哈佛大学戏剧博士等,发起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博士下乡”运动。全部人员不仅富有专业意识,且具有传递知识和转化知识的能力,并获得高薪待遇。如担任社会调查部主任李景汉每月高达150元的薪水,而相同的职位在梁漱溟的邹平实验中月薪只有15元。据统计,1931年前后,定县就聚集了500多名愿意献身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定县实验中乡村建设的“领航者”。除了组建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专家团队,晏阳初更加重视乡村工作专门人才的培养。1940年,他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为乡村工作培养专门人才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培养劳动者的体力、专家者的智能、教育者的态度、科学家的脑袋、创造者的气魄和宗教家的精神六大教育目标的指导下,涌现了大批务实创新、责任担当、富有能力的乡村建设人才。可见,人才兴,则乡村旺。当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吸引优秀人才充实乡村振兴专业人才队伍成为关键要素。因而,要想充分发挥乡村职业学校各类人才培养阵地和人力资源优势开发平台,首要任务是缓解乡村职业教育教师资源稀缺矛盾。借鉴晏阳初乡村人才建设经验,一方面可以通过政策倾斜、制度创新和市场调节,如提高教师薪资待遇水平或建立城乡岗位流动机制,吸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职业学校工作,促进以教师为核心的优质教育资源回流农村,另一方面可以积极培育本土化乡村专业人才,完善农村职业教育教师素质提升计划,加强城乡教育资源融合发展,建立农村职业学校和城镇职业学校教师对口帮扶交流机制,通过深造、培训、挂职等多元化方式引导教师自我发展,拓宽农村职业学校教师发展路径。

(三)内生式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路径

从社会学视角进行反思,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救亡的社会语境中不自觉地从外在视角出发对乡村“问题”进行建构继而实施“改造”,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也自然成为模仿西方社会文化的工具。^[8]事实上,定县乡村建设实验很难具备可复制的现实条件,乡村自身的活力也并没有被激发,贫困落后的面貌也没有因大量外部资金的输入而得到根本改变。因而,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必须要基于历史和当前乡村社会发展现状,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性发展动力。一是立足比较优势,挖掘产业特色。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其中产业兴旺是基础,因而,必须变外来开发型为内生式发展,根据各地区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精准施策,鼓励和调动当地村民参与乡村建设发展的热情,积极培育市场主体,打造“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特色发展模式。二是对接精准扶贫,提高自我发展能力。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一方面通过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贫困人口通过就业或创业最大限度地消灭贫困存量,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为贫困家庭子女提供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阻断贫困的代际传承,减少返贫或增贫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 [1]董修甲.中国地方自治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268-271.
- [2][3][5]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一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114-115,175,246-247.
- [4]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1:147.
- [6]徐文新,肖称萍,张学兰.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劳动力精准培训策略研究[J].职教论坛,2018,(7):41.
- [7]欧阳忠明,李国颖.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过程中的学习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6):60-66.
- [8]王彬.晏阳初乡村教育话语的知识社会学反思[J].当代教育科学,2016,(11):56-60.